

# 移动之悖：全球新冠疫情传播的人类学反思

彭兆荣

---

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世界，导致其如此快速、迅猛传播的“病毒来源”尚不明确。笔者认为，致使疫情快速蔓延有一个“无形宿主”，即移动属性。现代“移动”成了疾病快速传播的“帮凶”。这提醒我们，当我们在充分享受现代移动性带来的便捷和高效时，谨防移动性同时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灾难。本文从文明演化进程的维度，结合新冠疫情与现代性关系进行评述，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几种有代表的移动属性进行分析，提出建立“全幅性移动”机制的设想，对当前疫情的防范提出具体建议。

关键词：移动 传播 新冠疫情

作者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地址：重庆市，邮编 401331。

---

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的灾难前所未有的，其特征之一就是在极短时间内的全球扩散。何以如此？移动性(mobility)起到了一个关键性作用，人群的快速移动成为疫情传导的介质。我们可以这样反问：如果不是现代的移动性，疫情可能如此迅速地在世界传播吗？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移动性事实上充当了疫情传播的“无形宿主”。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段，直至当下，世界各国制止疫情传播的最常见方式是“禁止移动”，特别是停止“人的流动”。隔离疫区、封城封国、停航停运、停工停课、限制社交、居家隔离等成了被迫采取的强制措施。概言之，“限制移动”成了最通用的手段，最无奈的选择。这警示我们，当我们热衷于讨论现代性的诸多特征的时候，却大多忽略了“现代性”与“现代病疫”的关系。新冠疫情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现代性移动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病源”，它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病源，却起到了传播上推波助澜的作用。移动属性不是单一性的，具有“双刃性”；当我们欣然接受现代移动性带给我们诸多好处的的时候，我们显然并未准备好应对移动性作为“潘多拉之盒”的灾难性。

## 一、原移动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移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孳入了复杂的历史关系属性。<sup>①</sup> 当我们在评

---

<sup>①</sup> 参见 J. Urry, “Climate Change, Travel and Complex Futur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9, 2008.

说今天的移动性时,已经不是简单地将其与人类过往的移动现象进行比较,而是需要检验、评估移动性如何成为生物(自然物种与社会物种)的历史“基因”,以及它在不同历史阶段作为传播“介体”的演变逻辑与功效。

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移动”属于生物本能。让我们再一次重温古代希腊神话俄狄浦斯在回家的路上,怪兽斯芬克斯让他猜的那个谜语:“是什么早晨用四条腿走路,中午用两条腿走路,晚上用三条腿走路?”这个著名谜语的谜底是移动的人,既表明人的一生从“四条腿(婴儿爬行)一两条腿(成年人)一三条腿(老人拄拐杖)”的生命自然历程图景,也表明人的一生通过移动所经历和经验的的社会化过程。正如人类学家根纳普(Van Gennep)在《通过仪式》的开篇所描述人的生命社会化过程:“任何社会里的个人生活,都是随着其年龄的增长,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移动的序列。”<sup>①</sup>既然人类作为“会动之类”(man-kind),人类学在研究的时候,首先也从“动”开始,即强调人的“动物性”(animalism)。人类学家利奇(E. R. Leach)将人类的“动性”视为“人类自然属性的一部分”。<sup>②</sup> 移动的两种属性,即移动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一直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

人类文明的演化、变迁和发展是人类学最为基本的观察线索。在这一条演化线索中,人类文明最初、最早的形态是“狩猎一采集生活”(hunting-gathering life)。作为原始部落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猎捕野生动物或采集野生植物是人类基本的生活来源和生计方式。“狩猎一采集生活”的特点是经常性的移动、游动,以便从自然中获取食物资源。“狩猎一采集生活”频繁移动,决定了其另一个特点,就是组成群体的人数较少,平均只有25—50人。人类学对此的解释见仁见智。<sup>③</sup> 早期的人类学曾经将这种“狩猎一采集生活”称为“原始的生活方式”,并给予了“野蛮人”“野蛮生活”等的错误判断,而且这样的声音几乎成了世界近代的“主旋律”,虽然偶尔可以听到所谓“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的声音。<sup>④</sup>

人类学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纠正了这些错误的评述和判断,代表性的反思见解是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中提出的:“另一项人类学对旧石器时代的偏见,恰是来自人类学自身的田野,来自欧洲人对既存狩猎采集者观察的文本,诸如澳洲原住民、布须曼人(Bushman)、奥纳人(Ona)、雅甘人(Yahgan)。这些民族志文本可能在两方面扭曲了我们对狩猎采集的理解。”其中之一是食物与土壤的关系,而像沙漠地带的生存便难以为继;第二个错误观念的源头,就是将游动型非定居者视为“前野蛮人”(exsavage)的错误判断。<sup>⑤</sup> 萨林斯重新讨论“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认为“他们生活在物质丰富之中”。<sup>⑥</sup> 原因正是那些原始部落生活需要配合大自然的节律,通过“游动”的方式获取食物。今天人类社会存在的一些弱点在狩猎采集经济中并不存在。周期性的游居,对财产和人口的限制,既是经济实践的必然,也是对环境的适应,而游动成了狩猎采集者的条件之一,在许多情况下超过其他方面的行

① A. Van Gennep, *The Rites of Passag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p. 3.

② 参见 E. R. Leach, *Custom, Law and Terrorist Violen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9—20.

③ 参见陈国强主编:《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9页。

④ 参见 T. Ellingson, *The Myth of the Noble Sav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⑤ 参见[美]马歇尔·萨林斯著、张经纬等译:《石器时代经济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10页。

⑥ 参见[美]马歇尔·萨林斯著、张经纬等译:《石器时代经济学》,第12页。

为；重要的是，游动性让他们放弃财富积累。因此，游动性和财富积累是截然对立的。<sup>①</sup>

简言之，狩猎采集以大自然为“衣食父母”的生活生计方式，没有生成屯积财产的动因和欲望，而倡导一种简朴、平静、友好的生活。以特定的“移动属性”为前提，配合人类狩猎采集生活的“原始”移动方式呈现出一种“原移动性”。这种“原移动性”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其一，与人类作为“动物”的根本属性保持最大限度的契合。其二，与自然保持友好关系，与野生动、植物的生长规律保持协调一致，移动与自然节律相吻合。其三，狩猎采集方式基本上不需要人工、人为的生产。其四，人口增长与自然提供的食物保持平衡关系，因此不会出现人口生育过多，也不会出现群体聚集的现象。其五，小规模的活动人群难以产生大范围的疾病，不会导致疫情的大面积传播；即使是出现疫情，也是小规模、小范围的、局部的。其六，避免了屯积财产“私欲”的膨胀。

作为人类原始时期的生存方式，“采集狩猎生活”使得那些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植物与人类保持“生命一体化”(solidarity of life)的关系。具体而言，原始人尚未将人类提升到高于其他生物种类的地位，也还没有达到逻辑思维层面。生命之间存在普遍的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便是其基本产物。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将图腾制度中的三个问题简化为：特定的动物、植物为原始人提供的食物关系；特定的动物、植物与原始人建立的亲合关系；图腾制度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自然条件的结果”。<sup>②</sup> 基于以移动的方式获取食物而形成的人与动植物的关系也成为原始思维(神话思维、前逻辑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sup>③</sup> 在这样的情境中，人为的有目的、有目标的捕杀野生动物和“野食”现象几乎没有可能出现。恰恰是到了今天，违背自然规律的滥杀野生动物和无节制的“野食”现象成了普遍现象，成为引发大规模疫情的可能病源。

由于原始人获取食物的方式建立在“游动”之上，“原移动性”也就成了“原始思维”的协作产物。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移动现象”不仅指个人或群体的迁移，也可以视为一种历史性的体验—认知—表述—践行范式。从长时段的角度看，“移动”具有历史延续的基因性质。比如，人类原始时期以游动为特征的狩猎采集的生计方式，与后来的游牧文明具有历史的关联性。作为一种文明类型，游牧的生计方式依赖于家畜与空间移动或游牧的协调共存。当今的游牧方式已经被看作移居者对于族群性(ethnicity)相异的社区或国家的多样适应性反应。根据历史进化理论，特别是中亚与西亚的历史告诉我们，游牧文化曾长久的影响着当地的文化，并在相当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sup>④</sup> 无论是历史的存续还是历史的表述，作为移动性的“游牧文明”一直都是人类文明中极其重要的种类和形态。需要提示的是，人类的“游牧方式”一方面是依“水草”而动，属于自然属性；另一方面，畜牧的对象是限制性的，主要为马、牛、羊等与人类生命保持无害关系的驯养动物。蝙蝠、穿山甲、老鼠这些动物难以上到人类的餐桌。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而有益的论述。<sup>⑤</sup>

概言之，人类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遵循着一种“原移动性”规则，这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虽然已经远离了我们，但无论是生物基因还是文化基因仍然存在，其“影响因子”并未因为时代的

① 参见[美]马歇尔·萨林斯著、张经纬等译：《石器时代经济学》，第14页。

② 参见[法]列维-斯特劳斯著、渠东译：《图腾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74页。

③ 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

④ 参见J. Okely, *The traveller-gyps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52—53.

⑤ 参见M.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0[1966].

久远而完全消失,其中某些“积极因素”值得我们珍视。作为一种人类文明的遗产,特别在此次新冠疫情面前,我们有必要重新审度移动范式中的基因存续与变异:“原移动性”大致属于遵从自然规律、节律移动的“基因存续”;而现代的移动性,某种意义上说,则属于人为、人工因素超越了自然原则的“基因变异”。

## 二、前移动性

按照“进化”线索,狩猎采集之后的文明类型是农耕文明。人类学常识告诉我们,农耕文明是在“狩猎采集”基础上,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逐渐发展出了以驯养栽培为人类主要的生计方式,把野生的动物、植物驯化为可养殖和培育的对象。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过上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其主要特征是保持与自然节律相契合的活动,比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是我们所说的“安居乐业”的模式。这种基本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不言而喻,人类以什么方式获取食物,以何种移动方式保证生存并使之得以延续,是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人类曾有过长达250万年以采集狩猎的方式获取食物的历史,农业革命改变了原始社会的狩猎采集方式,加速了文明的推展,人们普遍把这种方式看作“进步”。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人类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选择了那些可驯化的、无害的动物和植物作为人类生存的食物对象,我们可归纳为“无害性食物选择”的自然过程。然而,此次疫情的一个病源可能与“食野”有关。“食野”可表述为“有害性食物选择”,即一种违背文明原理的价值、习俗和行为。

由此追溯,人类的“文化”“文明”也深深地留下“移动属性”历史变迁的印迹。从概念上看,西方的“文化”(culture)有“培育”“改良”“纯化”的意思,看一下农业(agriculture)这个词就能明白。西方“文明”(civilization)的一种解释是:由集约粮食生产维持的,能够提供管理、商业、艺术等的有组织的复杂社会。<sup>①</sup>我国古代的“文明”与农业关系密切。“文明”一词初见于《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释:“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由是,农业的根本问题就是人与土地的关系,是根据“天时”而进行的活动,即不违背自然节律的生计方式。在这一点上农业活动仍与狩猎采集的原移动形态存在关联性,并由此生成演化出了土地与人的关系——“佃”,即人耕治田;<sup>②</sup>以及生产作业的社会化分工,比如“男”就是指在田地上卖力的人。

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属于小农经济,主要表现特征为:在生产形制上,与土地的紧密“捆绑”;在经济形态上,自给自足;在男女分工上,男耕女织;在最小存续单位上,是以“宗族”线索的“家(家庭、家族)”;在继嗣法则上,汉族主要以父系世系为线索;在社会结构上,是“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sup>③</sup>

农耕文明的根本是什么?我们也可能理解为一种特定的土地与移动关系。费孝通先生将

① 参见[美]约翰·奥莫亨德罗著、张经纬等译:《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② 参见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语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451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这种关系表述为“乡土中国”（“土地捆绑的中国”）。“中国人的生活是靠土地，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sup>①</sup> 因此，离开土地，比如逃荒，不仅表明舍本求末，更表明遭到灾难。“灾荒”经常连用，“荒指农业生活停顿，灾指土地无法耕种的情形”。<sup>②</sup>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sup>③</sup> 其实，费孝通先生已经清楚地阐明了农耕文明的移动特征。相对今天全球化的“移动性”而言，笔者称农耕文明的移动特性为“前移动性”。“前移动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在于受土地“捆绑”的限制性移动。

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也会出现一些疫情和地方性疾病，但传播速度和范围都非常有限。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江西省新余县等地发生了血吸虫病疫情，并没有形成全国性传播，而且很快就消灭了病疫源。毛泽东为此写下了诗篇《送瘟神》。前移动性还有一个特征：传统的村落是“自然村形制”——一种有相对空间距离的人群居落。这样的空间形制，也不至于出现以传播快速为特征的新冠疫情。

所谓“限制性移动”，可以理解为人与土地的“捆绑”为常态，脱离“捆绑”为异态。其实，直至今日，我们国家的主导性宣传口号，诸如“和谐社会”“安居乐业”“安定维稳”等皆透露出传统农耕文明的常态和本色。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的安居乐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不需要过分、过度的交流、交换和交通，因而也就不必要过多、过密的流动和移动。传统中国是一个礼教社会，“孝”为先、为大。《左传·文公二年》：“孝，礼之始也。”孝字表达的形象为老人在上，小子在下，表示儿孙搀扶老人。造字本义就是儿孙搀扶老人，服从和奉养父母、长辈。《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在以孝为常伦的乡土社会中，孝就是不离不弃。“离土”则有悖常伦。《论语·里仁》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成为符合传统伦理的经典表述。换言之，离乡离土为“大不孝”，只有极少数情况例外，此不赘述。

乡土社会以“乡（乡）”为基地。“乡”是一个公共单位，是一个稳定的、以不移动或少移动为基本形制的人群共同体。《孟子·告子上》：“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注：“乡，犹里也。以喻居也。”乡引申为“家乡”“故乡”等义。《说文解字》：“乡国离邑，民所封乡。”有学者解释，“乡，向也。民之所向也。”乡更接近于地方上的邑、聚落。<sup>④</sup>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面对面、不离不弃、乡里乡亲。“乡里乡亲”其实是一幅中式农耕伦理情景图。

在乡土社会里，离家常表述为“背井离乡”。“乡”和“井”意义相近。井，从字形上来看，像两纵两横构成的方形框架，表示人工开凿的提取地下水、有方形护栏的水坑。水是人们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因此，在村落的寻建之初，首要者即开凿水井；又由于中国传统的汉族村落的建立，是宗族扩大分支的产物，多为同宗同族。村井不仅是村落创立之初的标志，也是特定人群共同体的共有资源。《说文解字》：“井，八家一井。象构韩形瓮之象也。古者伯益初作井。凡井之属皆从井。”钱穆考释：“井的发明者，《世本》既说是伯益，又说是黄帝。或者是两个独立的发明，或许有前后的改进。井解决了水的问题。”<sup>⑤</sup>在我国古代社会，乡土一井田形成了稳定的关系机制，即与“田”相属的“农户一家族一宗族”群体。“井”也就成了“家”的代表，也变成了“家乡”的代表性符号。同饮一井水的人也就是“一家人”，所以，“背井离乡”成为最为不堪的

① 费孝通：《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② 费孝通：《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第330页。

③ 费孝通：《乡土中国》，《费孝通文集》（第五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17—318页。

④ 参见[日]池田雄一著、郑威译：《中国古代的聚落与地方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5页。

⑤ 钱穆：《黄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0页。

惨境。

概言之,“前移动性”的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与土地“捆绑”的乡土社会(乡土性)。其二,特定宗族分支建立的村落共同体(宗氏性)。其三,自给自足,安居乐业(稳定性)。其四,父线世系的继嗣法则(传承性)。其五,代际有序,孝悌常纲(伦理性)。其六,自然村形制(间隔性)。在这样的自然形态和格局中,类似新冠病疫这样的现代疾病难以滋生。

### 三、移动性

当今世界进入“全球化”(globalization)时代,“全球化”的一个公认特征就是移动性(mobility),即移动性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属性。也可以这么说,移动性成为“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述形式。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简述其特点为:“全球化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述。全球化使在场与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在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sup>①</sup>具体地说,现代性像链条一样把世界不同的“地方”和“地方事务”连接在一起,有学者将它糅合为“全球地方性”(glocality)。<sup>②</sup>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全球—地方”现代性的“整合—撕裂”现象,并将其具体化为“无地(化)”“他地(化)”“再地(化)”等现象。今天,新冠疫情使之多出了一种“疫地化”,即在一个具体的“地方”发生具有全球性关联的病疫事件。

因此,移动性也在无形之中成了现代性表述的一种“风险化指标”。“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它同时也导入了一些先前年代所知甚少或者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sup>③</sup>为此,我们可以将其复杂的逻辑关系简化为:移动性作为全球化的一种属性,成为现代性的基本表述范式,“地球村”将人们所有的事务集聚在一起,也让像新冠病毒这样的病疫有了滋生的土壤。吉登斯同时提醒我们:“在某一个既定情境或情境类型下对一个或一群行动者的选择余地有所限制。”<sup>④</sup>虽然,这种提醒并非针对新冠疫情,却旨在提出一种新风险的防范原则。

移动性作为一种全球化新的属性,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需求所产生的生产、消费、知识、信息、资本、技术、交通、安全、金融、商业、服务、旅行等全方位、空前移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越来越明显和广泛的加强,使得在某一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反之,在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对某一地方也造成比以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sup>⑤</sup>这就是现代性的移动图景。阿布拉杜莱(A. Appadurai)将之具体概括为以下五种:

其一,族群的图景(ethnoscape)。不同的民族、族群和人群呈现大规模的移动现象。其二,技术的图景(technoscape)。科学技术扮演了一个无以替代的“移动性”重要角色。其三,金融的图景(finanscape)。全球资本的流通加速,资本流动空前活跃。其四,观念的图景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② 所谓“全球地方性”(glocality)是20世纪80年代由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提出的。其目的是打破人们原先关于内/外,我者/他者,这里/别处等界定认同界限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在信息化时代,人们既生活在这里,又从别处来衡量自己,既有自我认同,又关注他者的看法,人们的认同和地方感塑造的方式应该重新界定,边界的概念也因此被打破。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引论),第4页。

④ [英]安东尼·吉登斯著、李康等译:《社会的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0页。

⑤ 参见A. Giddens, *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 64。

(ideoscape)。人的移动带动了观念的移动。社会价值和观念形态加速进行传播与互动。其五,媒体的图景(mediascape)。现代传媒方式展示巨大的信息传播和流动能力。<sup>①</sup>

今天,许多人还只是将现代的移动性局限于工具层面来认识和使用,就像“移动电话”(mobile phone)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功能,越来越大的效益,越来越快的信息那样,殊不知,现代的移动性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简单“工具性”,演化为一种认知性思维形态,包括认知—知识—实践—表述的完整形制,并逐渐形成新的社会惯习。以往相对封闭的单位,相对单纯的社会关系,传统获取知识的方式,缓慢的文化特征等逐渐弱化甚至消失。现代社会的“移动性”还表现在价值观念的“移动”和“转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表述形态。移动性“携带”着诸如符号、隐喻、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以空前的速度加快扩散。<sup>②</sup>

总之,移动性作为新的社会属性正在改变人的思维模式,包括人们认知事物的形态,知识获取的方式,交流沟通的手段,日常生活的情状等。移动性使我们越来越离不开它,殊不知,移动性也可能演变为灾难。

毋庸置疑,现代移动性对传统的农耕文明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独反映在价值的骤变上,更反映在人们的行动中;比如“农民工”就是一个需要进行反思性讨论的社会现象。今天,“背井离乡”不但不被指责,反而成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时尚。尽管这一概念现在已经固化,为大家所接受,但笔者以为“农民工”这一概念充满悖论和矛盾,仍有待辨析。西方的“农业工人”,无论指在农村以工业化的集约性进行农业生产,还是指原来的农民变成按时上下班,按月拿工资的工人,都没有离开土地和农业;而我国的“农民工”则是离乡离土,进城务工(非农)。这种价值巨变、背离在今天获得完全正面的肯定,其评价依据是以城市的权力话语为主导的经济学。然而,经济学并非历史发展与变迁的唯一评价标准。以农耕文明中与土地捆绑的、相对静止的、安居乐业的、自给自足的、孝道伦理的、不离乡离土的“限制性移动”来看,今天的“农民工”现象事实上是对传统农耕文明的“反走”和“反动”。

这种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其实暗含着一种强势的权力话语:城市优先。不幸的是,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基本上就是爆发在城市,而且集中在大城市,疫情最轻的却是乡村。这也促使我们对传统的“城乡”关系进行重新反思和评估。如果说现代化的城市“活力”来自快节奏的移动的话,那么,由移动性带来的伤害也更大。原因当然是移动的节奏和数率问题。于是,传统人类学研究对象中“静止的社区”重新又被提出。中国传统上是一个以乡土为基本特征的“社稷”国家。其根本特征为乡土。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价值大都从“乡土”中生长出来。同时,与“天时地利人和”保持最为贴近的移动关系,即自然的移动。如果说现代的移动性在大城市找到最佳的“落脚点”的话,也意味着它把最大的“危险性”带进了大城市。此次新冠疫情和17年前的“非典”或能让我们在快速的前行中驻足片刻,回顾一下我们曾经出发的乡土家园,重新评估当世的城乡关系。

概言之,如果城市化的快节奏仅仅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形态和范式,那么,新冠疫情却给出了一个反证,即加速的人为化变态,或对财富的过度化追求,导致了“超移动性”“超密度社

<sup>①</sup> 参见 A.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M. Featherstone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pp. 295—310。

<sup>②</sup> 参见 J. C. & Urry Rojek eds., *Touring Cultures: Transformations of Travel and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10—15。

区”的出现,客观上成了疫情的滥觞和扩散的“重灾区”。于是,推展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乡土城市”或将成为我们反思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即在保持传统中华农耕文明的基础上,将那些可转化性元素、因素植入和注入中国的城市发展之中。

#### 四、移动性预警

任何新的社会属性在功能上都不是单一的,“移动性”亦然。移动属性的另一面,即负面性经常被我们所忽略。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的爆发给了人类一次深刻的教训。疫情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移动性”惹的祸。而我们还来不及做好相应的预警和防范。面对此次“战疫”,我们除了团结起来,战胜疫情外,也警示我们,我们对“移动性”可能带来的危情显然准备不足。窃以为,现代移动性可能带来的两种“疫情”最需防范:疾病疫情和网络疫情。

关于疾病防疫,我国从古到今积累了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回顾、思考和借鉴。殷商卜辞中有“疾,亡入”的记录,意为不要接近得了疫病的病人。《汉书》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中国防疫史上较早和比较规范的记载。我国历史上记载的瘟疫多不胜数,《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1840年以前就有826条记录,其中有不少疫情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过重要影响。

对于传染性疾病的认识,我国的医学传统自成体系,首先是对传染性的认识。隋代巢元方说传染病是“乖戾之气”,有其特殊病因。明代著名医家、《温疫论》的作者吴又总结成了“戾气”学说,指出“气即是物,物即是气”,指出疫病病因可能是某种不可见的物质。其次是对疫病的预防与治疗。再次是完善防控措施。晋朝已经形成了制度化的防疫措施,《晋书》记载:“朝臣家有时疾,染有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我国历史并不缺乏疫情,也不缺少医治疾病的“妙方”,特别是近代以来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经验,值得继承、发扬和创新。<sup>①</sup>关于疫情的防治,笔者非医务工作者,不敢妄言;不过,此次新冠疫情与历史上所有疾病都不一样,“移动性”成了一种传播媒介,成为新型疫情的“宿主”(host)。所谓“宿主”就是寄主,原指为寄生生物包括寄生虫、病毒等提供生存环境的生物。我们借用这一概念指喻移动性的“寄生”与传播功能。与此同时,我们也清楚看到,中医药对发生在我国新冠病毒疫情的防治和防控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为全世界的疫情控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不言而喻,“移动性”最有代表性的形式是人的移动,最有代表性的形式是旅游。因此,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受伤最重要的也是旅游业,为什么?原因在于旅游是“人的移动”最集中、最密集、最快捷的形式和形态。旅游人类学家曾经为旅游的中、长线发展“搭建”了四个平台:

其一,鼓吹平台(Advocacy Platform)。旅游作为一种移动商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旅游与“移动性”相结合,特别是从经济利益方面。

其二,警示平台(Cautionary Platform)。旅游的发展也存在消极因素,包括环境污染、社会污染、季节性失业增加、文化艺术商业化等。“警示平台”集中对待旅游活动中消极的、负面性影响和作用提出“警告”。可惜,在过去学者搭建的“警示平台”中没有警示疫情传播的内容。

其三,适应平台(Adaptancy Platform)。旅游所携带的移动性包含着正反的不同价值和

<sup>①</sup> 参见郑洪:《中国历史上的防疫斗争》,《求是》2020年第4期。

效益,因此,如何从正反两方面适应当代的旅游发展,需要更理性、更策略性地去思考旅游。此次疫情也为我们提出了包括对各种可能在旅游中出现的危机和险情的适应性指标。

其四,以知识为基础的平台(Knowledge-Based Platform),即对前三个平台更加全面的、综合性的知识平台。首先,把旅游与现代移动性相结合看作一个全球化产业。其次,注意旅游发展中的需求性和非需要性之间的关系,特别注意消耗与获得利益之间的平衡。再次,集中注意前面三个“平台”的发展形式以及“部分的”或“限制性”的视野。最后,把旅游当作“一个整体”(a whole)或“一个系统”(a system),由此去理解其自身的结构与功能,进而建构起相应的“知识体系”。总之,“以知识为基础的平台”是从如何积极应对这样一个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旅游的。<sup>①</sup>

新冠疫情促使我们在警示平台中增设疫情警示的内容。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大众旅游出现,到了80年代,旅游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社会生活的时尚。正如旅游人类学家纳什(D. Nash)所说,旅游是“前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重要现象和因素,<sup>②</sup>并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种产业,<sup>③</sup>将旅游业、交通业、金融业、酒店业、餐馆业、服务业、保险业等多种行业涵括进来,现在还需要增加疾控业。

作为移动性直接产物的大众旅游,其自身原本就同时具有两种特性:既是移动性的受益者,又是移动性的受害者。具体而言,大众旅游因现代移动性而出现;而疫情却强制性地停止移动,而且是没有任何预兆的“停止”。也就是说,旅游在没有任何预兆、预示、预警的情况下戛然而止,仿佛心脏病突发而“猝死”!因此,旅游预警也将成为未来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其实,旅游人类学在以往的研究中相对重视旅游的中、长线效益和后果,也包括旅游可能造成的负面效益,也有“警示”,但都是长线的。此次疫情告诉我们,要对旅游做“骤止”的警示和防范应对,旅游需要兼顾短线、中线和长线;否则旅游业将不堪其害。17年前的“非典”和当下的新冠病疫,受伤最重的行业中旅游业必在其列。据世界旅游组织的统计数据,因新冠疫情致使世界旅游业损失高达1.2万亿美元。<sup>④</sup>

移动的悖论性决定了旅游的悖论性:一方面,它是现代移动性积极因素的受益者;另一方面,它是现代移动性消极因素的受害者。同时,旅游形式本身也具有非故意的“侵略性”。人类学家曾把现代旅游视为“帝国主义行为”,<sup>⑤</sup>其后果是重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麦克内尔(D. MacCannell)在《空聚场》一书中认为:“人们浪迹天下的意识在旅游行为中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建立完整世界中永久性的家居生活。”<sup>⑥</sup>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现代社会“稳定”的家居生活和社会秩序正是通过不间断的“移动”方式获得的。这种悖论的表象构建正是通过“不讲理”的移动性所建立。“帝国主义话语”的本质就是不讲道理,破坏既定规则。如果我们把移动性理解为一种“帝国主义行为”,那么,它带给人类的灾难也是史无前例的。

① 参见 J. Jafari, “The Scientification of Tourism,” in V. L. Smith & M. Brent eds., *Hosts and Guests Revisited: Tourism Issues of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Sydney/Tokyo: Cognizant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2001, pp. 29–32.

② 参见 D. Nash, “Tourism as an Anthropological Subject,”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2, No. 5, 1981.

③ 参见彭兆荣:《旅游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④ 中央电视台2020年7月2日新闻联播报道。

⑤ 参见[美]丹尼森·纳什:《作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的旅游》,瓦伦·L·史密斯主编、张晓萍等译:《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48页。

⑥ 参见 D. MacCannell, *Empty Meeting Ground*,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5.

概言之,旅游作为移动性的当代例证揭示了这一社会属性的两面性:一方面,以当今社会空前的形式和形态加速着“移动”的扩大、扩散和扩张,并由此产生出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由此带来了巨大的危险、危机和危情也是空前的,移动、旅游、疫情三者在特定的情境中也可能成为关联性的危害共体。

## 五、结 语

此次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促使我们从战略和策略的全方位进行思考和行动。面对正在肆虐的疫情,我们需要积极地寻求、寻找治疗方法,做好具体的防范工作。以下几个方面或可重点考虑:

第一,对疾病传播可能导致的大范围灾难需要做好切实的防范措施,树立预防、预警与治疗同等重要的理念。

第二,最大限度地保持与自然一致的生命节律,不是所有的事务都要一样的“快速发展”。自然节律,比如二十四节气仍要为我们所倚重。

第三,限度性地恢复和保持乡土社会的单一性村落和社区形制,以防备在灾难时期仍然能够保持相对独立、不受根本影响的生产、生活状态。

第四,加强公共疫情的防范工作,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防范体系。

第五,完善立法,严格执法,禁止捕杀、食用野生动物,切断可能“病源”,建立公共防疫机制和饮食安全系统。

第六,建立两套治理和应对机制,要有快速移动和暂时静止两套管理体系。一方面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另一方面,做好“快速传播”可能性的防范工作,保证在最紧急的情况下仍然有从容应对的机制。

第七,在城市快节奏发展的同时,加入“城市隔离带”的设计和修筑方案,同时,保护、保持乡村社会生产、生活的稳定状态,保护、保持“自然村”范式,以防疫情传播的危险。

第八,提倡与现代快速移动相反的“慢游”方式,鼓励新型的旅游体验方式,特别是生态游和乡村游。

第九,做好针对移动性预警、防范的产、学、研配合,开展移动性预警的应用—协同研究。

第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协作,移动没有国界,疫情没有国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包含共同防范疫情危险和风险的内容。

面对此次疫情,我们除了做好面对疫情的具体工作外,还需要建立一种反思的原则,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现代性思维和建构新型移动范式的高度。人类移动属性的历史演化具有内在逻辑性,它是我们评价、评估人类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的重要依据。我们不妨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视为全球化背景下一出全新的历史“移动剧”。当今世界,移动性已然将人、物、信息卷入到空前的互动关系机制之中,<sup>①</sup>动的幅度、动态与静态,已经从工具层面上升到人类思维的高度,甚至关乎到了人类的命运。移动性已然超越了全球化背景下所谓“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表述,而刻意描述当代世界的移动形貌成为一种范式,包括对问题、理论和方法的

<sup>①</sup> 参见 M. Sheller, "Mobility (Review Article)," *Sociopedia. isa*, 2011:1-2. DOI: 10.1177/205684601163. [online] <http://mcenterdrexel.wordpress.com>

全面更新；<sup>①</sup>也就是说，移动性已经不再只是对现象平面的数据化表述，而是延伸到“新移动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的层面。

鉴此，笔者提出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幅性移动机制”的设想。“全幅性移动机制”在充分评估相关产业、行业、事业的独立与协作的基础上，制定出三种移动的幅度：前趋、踏步、反走。具体而言，前趋指迈开与世界发展同步的步幅，特别在高新科技等方面努力赶超世界水平；踏步指保持自然节律，贯彻“天地人和”的道理，继承中华传统农耕文明遗续中所创立生态、生命、生计、生产、生业“五生一体”的形制，<sup>②</sup>不人为地增速，不以“运动”的方式加速，不以“科学”为幌子的强行提速；反走指在某些领域、某些行业、某些事业确立“往回走”的方略，比如在自然生态、生物多样性、人与生物圈、各类遗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事业中，倡导回归原始、回到原初、回复原貌的方针。概言之，制定“全幅性移动机制”也是针对此次新冠疫情所提出的一种综合性治疗与防范的设想。

〔责任编辑 刘海涛〕

<sup>①</sup> 参见 M. Sheller and J. Urry,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 38, No. 2, 2006。

<sup>②</sup> 参见彭兆荣：《生生遗续 代代相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彭兆荣：《重建中国乡土景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